

郝躍南 著

道的承擔與逃逸

◎ 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及文化闡釋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I206.09/12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道的承擔與逃逸

——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及文化闡釋

郝躍南／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6672

巴蜀書社

2000·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道的承擔與逃逸：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及文化闡釋/
郝躍南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0 11
ISBN 7-80659-143-5

I. 道… II. 郝… III. 文學理論—對比研究—中國—
六朝時代、唐代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76744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道的承擔與逃逸

郝躍南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 (028) 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2.125 字數 280 千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冊

ISBN 7-80659-143-5/B·25 定價：2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古代文論研究，大有文章已做盡之勢。而六朝與唐代文學、文論更是為學者所傾心的熱點，有着那樣多的成果與突破。要在這裏有所創獲，其難度可想而知。

故而，當我指定六朝與唐代文論比較研究這個選題方嚮由躍南君做博士論文時，實際上還是有所擔心的。除了選題的難度外，還因為躍南君在黨政機關工作，在職攻讀博士，學用“脫節”和時間不足就構成他治學的兩個大障礙。然而，他以自己的勤奮和獨有的理論視角取得了成功，這就是這部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專家推薦納入四川大學 211 工程項目出版的博士論文《道的承擔與逃逸》。作為他的指導教師，我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

這部論文的學術創獲，同行專家在評閱、評議中都給予了一致的肯定，且摘錄幾段予以說明：

“六朝文論和唐代文論研究者甚多，但把二者作比較研究，從而找到其內在聯繫和差異，尋索其發展中有規律性的契機，則尚少有人研究。從這意義上說，此論文是有學術開拓精神的。論文不僅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而且對文論現象作了文化學闡釋，並從宏觀上對兩個時期的文論作了總體透視，故使六朝文論和唐

代文論研究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價值是明顯的。”（雲南大學張文勛教授評語）

“論文從宏觀的角度，運用比較的方法，對六朝與唐代文論的差異作了深刻的揭示……我認為所有這些論斷都頗為精辟，其論證也較為充分、細密。相對以往對六朝和唐代文論研究而言，無疑是一種理論上的提昇。論文對導致兩個時代文論的差異的文化根由的探尋，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更是一種新的嘗試與開拓。作者把兩個時代士人不同的命運作為文化闡釋的邏輯起點，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價值觀的演變作為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的最終根由。這無論從立論上、研究方法上，以及整個行文的風度上，都表現出作者一種特有的學術追求。”（華東師大齊森華教授評語）

“論文有創新意義，特別是從士人價值取嚮的角度，來看文論的形態。承擔‘道’為己任的價值取嚮，則規定了文論的功利主義形態，而這一價值的淡化與轉嚮，則導嚮文論的審美主義形態。作者從中提取了‘命運——價值——文學（文論）’的新思路，並以此思路考察六朝與唐代不同時期的文論的不同。且這一思路具有普遍適用性。個案分析也較為成功。是一篇優秀論文。”（北京師大童慶炳教授評語）

“作者選擇對士人價值取嚮的演變與文論發展衍化的關係這一對矛盾運動的動態圖像的檢索與辯析作為整部論文的理論框架，是很有開拓意義的，‘差異’的闡釋也具才力，體現了作者的學術識度與文化胸襟。論文中關於‘兩種自由’、‘兩種價值’、‘兩種理性’的論述與判斷亦很有學理深度，值得贊賞。”（中國社科院胡明研究員評語）

當然，同行專家評議也同時指出，論文對士人價值和文論現

象的複雜性情況和例外注意不够，某些論述不充分，等等。

上述這些意見也正是我所持有的，我想補充說明的是，躍南君選擇士人價值演變作為研究文論現象的切入點，是有其學以致用的主觀追求的。這就是他對價值追求在文化創造和其他社會行為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價值轉型的關注，而價值轉型又是由社會歷史演進嬗變所主導的文化轉型所規定所導嚮的。而我們當前所處時代，正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這種主觀追求也是有所創獲的，專家評議在肯定該論文“對於研究‘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具有現實意義”（復旦大學顧易生教授評語）的同時，也肯定其有政策性意義，中國人民大學蔡鍾翔教授評議道，作者“從政治文化大背景考察文論現象，能接觸到問題的本質，並提出不少創新的見解。”“對六朝與唐代文論差異作出闡釋，實際上總結了時代與文學、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不平衡現象的規律性，對於研究古代文論嬗變的原因具有典型意義，對當前如何制定和調整文藝政策以利于文藝沿着正確方嚮發展和繁榮也有一定的藉鑒意義。”

同時，躍南君在學術研究中也顯示了自己的價值取嚮，這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民生”、“諫諍”、“正君”、“俠義”等等“道的承擔”的推崇，而這些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經過現代意識的過濾、選擇和轉換，是可為今而用的。躍南君在黨政機關從事宣傳文化工作，這樣的知識積累、致思方式、價值取嚮，對他的工作和為人無疑是大有助益的。“道的承擔”是一種值得推崇的人文精神，在眼下這個非常功利化非常物質化的時代，尤有倡導之必要。

曹順慶

2000.9.10 于四川大學 14 宿舍 9 幢

引 言

這是一個強盛的帝國。

它的軍事力量強大，府兵制的實行，使兵農合一，“無事時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新唐書·兵志》）

它的經濟繁榮，杜甫詩有名句：“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憶昔》）雖不免有藝術創作理想化之嫌，但參照時人多方記載，基本可以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它以開明的胸懷與多樣化的懷柔——羈縻手段，造成多民族歸附。唐天子不僅是漢人的皇帝，而且被“諸藩君長”尊為“天可汗”（《唐會要·雜錄》），成為各民族的最高共主。

它疆域遼闊，極盛時勢力東至朝鮮半島，西北至葱嶺以西的中亞，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前王不辭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載之鄉，并為州縣。”^①

這裏說的是——大唐帝國。

① 《唐大詔令集》卷十一“太宗遺詔”。

它的強盛，也凸現于文化的開放上。以強盛的國力為依憑，以朝氣蓬勃的世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唐文化首先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無所畏懼、無所顧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氣派。

胡漢之別，夷夏之辨，這裏被化解了，胡服、胡妝、胡曲、胡音、胡樂、胡舞、胡騎、胡俗、胡食……作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將一股豪強俠爽之氣注入作為農耕民族的漢文化體系之內，胡氣氤氳，使唐文化熱烈多彩，更富生命活力。

唐人以海納百川的博大的胸懷容攝着來自異域的文化英華：南亞的佛學、醫學、曆法、語言學、音樂、美術，中亞的音樂、舞蹈，西亞的漢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醫術、建築藝術乃至馬球運動等等^①。公元7—9世紀的長安，成為一個世界性都市，鴻臚寺接待了70多個國家的外交使團，接納了多達三萬餘人的外國留學生；外域商人在這裏廣設酒店、珠寶店。據統計，“在長安城一百萬總人口中，各國僑民和外籍居民均佔到總數的百分之二左右，加上突厥人後裔，其數當在百分之五左右”^②。外域文化的涌入，使唐人文化生活更添萬千風采。

文化政策的開明寬鬆，無疑是大唐帝國強盛的又一個顯著標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統治者尊道、禮佛、崇儒，三教并行，各得其所：李唐王朝奉老子李耳為先祖，煽起道教風行，道觀遍佈，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士數以萬計^③，處處可聞僊樂嘹亮，可見香烟繚繞；佛教也恰逢其時，扶搖直上，京畿長

^① 唐時進入中國文化系統的外域文化雖可分為中亞、西亞、南亞三大支，但其文化背景又與歐洲相關。日本學者井上清在《日本歷史》中指出：“唐朝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參見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581。

^② 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156。

^③ 參見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頁185。

安，寺廟薈萃，佛塔林立，和尚們春風得意，“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韓愈《華山女》）；一度式微的儒開始振興，唐高祖“頗好儒臣”（舊《唐書·儒學上》），唐太宗“銳情經術”（《新唐書·儒學上》），帝王們的大力倡導，帶來“儒學之興，古昔未有”（《貞觀政要·興儒學》）的新局面。三教并存不悖的意義在於：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態形成于世，人們不以一教為尊，亦不必以自己的信仰去屈從于一尊意志。人們注意到，唐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惟一一個沒有建立起單一思想統治的大一統帝國，朝野上下確乎洋溢着一股比較自由的空氣。

“藝術家創造的才能是與民族的活躍的精力成比例的。”^①帝國的統一和空前強盛，寬鬆自由的文化空氣，使這一時代的士子充滿前所未有的時代豪邁感，充滿對前途的向往與自信，他們熱情洋溢，積極進取，詩情勃鬱，充滿藝術創造的渴望與激情。於是，中國乃至世界藝術史便擁有了一份奇珍異寶：驚采絕艷的詩歌，流蕩奔騰的古文，極妍盡美的書法，燦爛求備的繪畫^②，盛大歡騰的樂舞……以及洋溢盛世雄風的建築、雕塑等等。

無疑，這是一個思想自由，情感充沛，洋溢着藝術氣質的時代，是一個情傾審美、求變創新的時代。然而，在文學創作以輝煌的成就照耀文學史、文化史的同時，在文學觀念上我們看到的却是另一景象：唐代文學理論“佔統治地位的，是復古載道派”，“主張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倫理教化服務”^③。“在文學理論方面，儒家以教化為中心的文學觀確實重新抬頭了。這並不是什麼進步

①（法）丹納《藝術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238。

②〔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近古之畫，燦爛而求備。”

③ 曹順慶《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部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111。

現象”^①。

昂揚開放的時代環境，豐富多彩的創作實踐，輝煌耀眼的藝術成果，却未能生成相應的充滿審美精神的理論成就，這是為什麼？強盛的大唐帝國在創造了一座輝煌的藝術高峰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一段遺憾，更留下一個歷史之謎。

二

當我們由唐回溯一個時代，來到魏晉南北朝，就會明顯地感覺到上述之謎又擴大了。

公元3—6世紀，正是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歷史時期最顯著的特徵莫過一個“亂”字：東漢後期，政治黑暗腐敗，外戚宦官兩大政治集團交相干政，互相傾軋，一片血腥氣味；黃巾大起義的金戈鐵馬之中，豪強軍閥蜂起，連年混戰不已；魏、蜀、吳三國鼎立，曹魏與司馬氏殘酷相爭，演成正始黑暗；司馬氏掌權，三國歸晉，西晉有八王之亂，匈奴鮮卑乘勢南侵，西晉覆亡，東晉建都江南，遂為南北分裂；東晉命祚百年，隨後有宋、齊、梁、陳諸王朝的依次更迭；在北方，則先有十六國割據，後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的政權嬗遞，直至589年，隋朝統一。這就是魏晉南北朝近400年亂世（當然，還應當看到，這一時期，仍有着範圍不小的局部統一和時間不算短的安寧，這是魏晉六朝經濟文化仍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

正是在這亂世的巨大歷史背景之下，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藝術

^① 章培恒等《中國文學史》（中），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0。

進入一個全面勃興的嶄新階段，留下彌足珍貴的遺產，而此時更值稱道的成果則是在文論方面。其首要標志是文論著作的大量涌現：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葛洪《抱朴子外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蕭統《文選序》、裴子野《雕蟲論》、蕭繹《金樓子·立言》等等，已讓人嘆為觀止，更有“體大慮周”的文論專著《文心雕龍》和專論五言詩的詩學專著《詩品》高峰峙立。尤其是《文心雕龍》，從文學的本質論、創作論、作品論、鑒賞論，到文體論、文學史、修辭學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藝觀點，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達到了當時所可能達到的歷史高度。“其論述問題之廣，體系之嚴整，不但是前無古人，甚至可以說後乏來人”^①。現代學者們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文藝理論的繁榮甚至形成了一個空前絕後的文藝理論高峰^②。

在中國文論史上形成第一個高峰^③。

出現了我國古代文論史上最光輝的創造，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命題^④。

文論著述的數量和形態，固然已見成就的輝煌，理論批評的精神內核，更顯示理論的實質：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觀念是充分審

① 童慶炳編《文學理論要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87。

② 曹順慶《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部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92。

③ 蔡鍾翔、黃保真、成復旺《中國文學理論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頁

④ 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6，頁7。

美的。後世大加伐撻的“嘲風月，弄花草”、“緣情綺靡”、“月露之形，風雲之狀”，正從不同側面體現着這個時代最值誇耀的特徵——對美的自覺追求。對此，美學大師宗白華先生有一段被反復徵引、充滿激情的經典性描述：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①。

從美學發展史來說，魏晉南北朝無疑具有革命性意義^②。正是這時的文學審美觀念的變革和發展，奠定了後代發展的基礎，“沒有這麼一個基礎，唐代文學——尤其是唐詩的進一步繁榮是不可想象的。”^③

歷史呈現于我們的現象，使我們不能不追問：

為什麼大唐這樣一個本身就充滿藝術氣質和審美創造力的時代，人們會對前代的審美觀念給予理論上的嚴厲排斥？

為什麼它會對自己所由產生的基礎嗤之以鼻？

為什麼盛世的文學理論成果反不如亂世？

① 《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載《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208。

② 吳功正《六朝美學史》認為：六朝美學對中國美學史的貢獻就在于它實現了美的解放。美學開始從道德、實用中剝離出來進而沉澱下來，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美學。這對兩漢而言，是歷史性的進步。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

③ 章培恒等《中國文學史》（上），頁306。

三

歷史之謎激起我們探索的欲望，尋找謎底便構成了研究的課題。

然而，大唐王朝和魏晉六朝，一個作為詩國高潮，藝術興盛的時代，一個作為思想解放，文學自覺的時代，已有多少先哲今賢們耕耘于其上，無數的成果閃耀着熠熠光彩高懸我們的眼前，作為一個後學者，憑我的學力能否在這塊領域裏得到新的收穫？初涉這一課題，便明顯感到它的難度。

任何一種研究，即使是最有功力的大師，都祇能是開拓新的視域，創建新的方法，開掘新的深度，達到新的高度，但永遠無法窮盡對象內在的蘊藏。然而一個新的視角將會開掘新的內容。比如：拿隋唐與魏晉六朝作比較研究就是還未有人系統涉及過的課題。導師如是說。導師的點撥，使我確定了研究的題目，也找到了研究的方法。而循着這一思路，在對歷史資料和前人成果的研讀之中，又發現了研究的切入點。

魏晉六朝與唐朝，文論主流具有明顯不同的特質，概括地說，一個是“審美中心”論，一個是“政教中心”論^①。對此，許多學者已注意到，並有所論及。然而，就我有限所見，對這種差異，大都祇是點到為止，論述比較概括，同時也顯得零散，集中、系統地將兩者作一比較，這樣的工作似乎還未有人涉及。于

^① 這種判斷是從宏觀的視角、從主流精神而言，實際上，唐代還有殷璠、皎然到司空圖“純審美”的一脈，而魏晉南朝仍有摯虞、裴子野等堅持詩教的教化說。但他們在各自時代文學思潮中並不佔主導地位。

是，這恰好就成為本文探索的“新大陸”。在對兩個時代文學理論作宏觀比較之中，我們至少發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差異。

一、文論主流性質的差異。即前面已提及的審美性與政教性的差異，其中還包含着“詩學突破”與“政教復歸”的不同：魏晉六朝突破大漢帝國的功利主義思潮，以“緣情綺靡”為鮮明標誌走向“文的自覺”，而大唐帝國則高擎“文以載道”的旗幟，回復到儒家“政教中心”的軌道。

二、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與矛盾性的差異。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與創作實踐基本是一致的；而唐朝則存在明顯的矛盾，它的時代精神與創作實踐呈現出開放與審美的萬千氣象，文學理論則高揚政教與復古的大旗而立場鮮明。

三、對前代遺產，唐人表現了一種值得注意的態度：一方面，放開手脚從六朝“拿來”使用，並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方面又三緘其口，幾乎不予提及^①。同時在整體上、總的傾向上，向六朝發起猛烈攻擊。

四

辨析了兩個時代文論的差異，問題自然地導向對原因的探尋。固然，任何文化現象都可以在政治、經濟的變遷中找到原因，然而政治經濟的變遷，對於文化現象來說，祇是一種更帶根本性的原因，它對某種文化現象起作用，須得經過一系列的中介環節，即它作用一種文化現象，通過這種文化現象再作用影響于

^① 如“風骨論”、“文道論”這些支撐唐代文論的主干，均從繼承六朝而來，但唐人却很少祖述所來根由。具體論述詳本文第七章。

另一種文化現象。對文學理論這種在文化結構中處於較高層次的文化形態，情況更是如此^①。如果沒有對這些中介的分析揭示，那麼對從政治經濟變化到文論變化的說明就將露出空疏、虛玄的窘相，而直接用政治經濟去說明文論變化，則將顯出公式化、套路化的牽強。本文認為，魏晉六朝與隋唐文論差異的主要根由，正在於兩個時代士人的價值觀和人格追求的嬗變，這正是時代（政治、經濟、文化）變遷影響文論的中介環節，也正是兩代文論變異的直接動因。

那麼，何為價值？價值哲學研究學者認為，價值是客觀外界（包括人自身）的屬性對人的意義，即對人的需要的意義。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動性根源，就在於為了滿足自身存在以至發展的需要，為了實現物質文化需要，即追求自身的價值實現。易言之，價值追求，構成了人類認識和實踐的原動力。

故而，歷史觀的研究不能排斥價值選擇。社會規律雖說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具有不依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但社會規律不是以自然物為中介，而是由人為中介來實現的，而人總是有預期目的，有自覺的價值追求的^②。

正是基於價值的這種主體性意義，文學的價值問題成為二十

^① 從文化形態學角度，宜將文化視作一個包括內核與若干外緣的不定形的整體，從外而向內，約略分為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和心態文化層，心態文化層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由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主體因素構成，又稱“社會意識”。依與社會存在關係的疏密程度又可將社會意識形態區別為基層意識形態（如政治理論、法權觀念等）和高層意識形態（如科學、哲學、藝術、宗教等），前者是經濟基礎的直接反映，儘管也受社會心理等因素影響，而後者的終極原因雖然也在於社會存在（尤其是經濟土壤），但它們畢竟遠離物質經濟基礎，同基礎的聯繫之間已隔着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包括社會心理和基層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雖然與文藝同居文化的高層核心部分，但其發展演進受經濟政治影響比起文學藝術來，則更為直接和顯明，並直接作用和影響文學藝術及觀念，故而本文將士人價值觀視作文論演變的動因。

^② 參李連科《價值哲學引論》第一章，商務印書館，1999。

世紀國內外文論界關注的熱點，因為“文學價值論本身是文學主體性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文藝學的時代問題”^①。文學價值論，主要從文本和人的關係角度研究文學問題，關注的是文學（文本）對人的審美需求的滿足與適合的狀況和程度^②，學者們從這一視角研究文學問題已收獲了可觀的成果，頗富啟發性^③。本文則在同一大思路下，從文化創造的主體——士的人生價值追求的視角，以求認識某種文學（文論）現象產生的主體性根源。

因而，對中國的士階層價值系統及其對文論的影響的所做的分析描述，就成了本文研究框架的切入點，進而構成對魏晉六朝與隋唐文論差異原因分析的理論支撐。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將本世紀初的思想先驅李大釗的這副對聯移用于中國傳統的文化人——士階層，是頗為傳神的。義無反顧地承擔“道”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使命，“士志于道”（《論語·里仁》），儒家先師孔子最先揭示了士與“道”的血肉聯繫，曾參則將老師的思想發揮得更加透徹而悲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以儒生為主體的士（士大夫）所承擔的“道”，是他們的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系統：王道與大同的政治理想，倫理主體的自我修養，積極入世的進取意識，諫上教下的社會責任等等。“文”，作為文化之“文”和作為應用之“文”以及作為文學之“文”，就是他們作為士的資格，也是他們價值的外化，也是他們承擔道的工具。價值執着不絕如縷，“文道論”也

① ②參見馮憲光《文學價值的追求》導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93。

③ 如本文所參考的馮憲光著《文學價值的追求》；敏澤、黨聖元著《文學價值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皮朝綱主編的《審美與生存》第二編《中國傳統美學的人生價值取嚮》，巴蜀書社，1999。

就生生不息。漢唐時代就是如此的情形。

然而，“士”們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承擔“道”的。在君主專制的時代條件下，“王道”與“霸道”、“道統”與“政統”呈現此盛彼衰、此消彼長的波浪運行，士的“道”意識也就有了盛衰之別，相應的，文道論、詩教論這些附着于擔“道”意識並以之為靈魂和動力的理論觀念，自然也有了強弱之異。從這一文化機制的矛盾運動中，我們就把握了魏晉六朝的“審美中心論”之所以生成，唐朝“政教中心”之所以復歸的深層文化機制。

五

本文從文化的視角觀照文論，闡釋文論現象，並非“文化熱”的趨時之舉，而是文論研究深化所必須。“藝術本當與文化生命同在前進。”（宗白華語）文論不祇是文學的存在，而且更是文化的存在。產生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必然地浸潤着該時期的思想文化精神，同時在總體上又受民族文化哲學精神的支配。士的價值觀念、理想人格，纔是促成文論基本性質演變的內在動因。而從古代文論的性質和內在結構中又可以觀照到、體驗到民族歷史文化的律動。并對中國文化的創造主體——士的主體意識、生命價值、理想人格獲得更明晰的把握。這樣，我們就把“死”的文本和“活”的士人結合起來，文論的發展演變就有了具體的活生生的歷史文化感。

世紀之交，“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已成為學術界所傾力探索的前沿課題。解決這一歷史性課題，我們首先面對的應當